

A

“别的事都能说，挂职这事就算了”

2015年1月，北京市新一批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副局级干部的名单已贴在网上多时，但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却视而不见。

“挂职那事已经开始了。”其实挂职也不是天天坐办公室，张颐武还在学校里呆着呢，课也照上，一切照旧。

记者打电话这会儿，平日里能言善辩的张颐武突然开始闪烁，“采访我别的事都可以说，但是这个事就算了，没多大意思。”

然后，连说三声谢谢、两声不好意思，张颐武便匆匆挂了电话。

按理说，“学而优则仕”已盛行了上千年，在文化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今学者们做官，怎么这么低调了？

历史学者鲁海听说记者采访“学者当官”这事，笑着摆摆手，连说不好答。

“今天要我做官，我怕是也做不了。”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在2011年挂职，是北京市首批挂职锻炼的学者。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挂职刚开始，还不好说，只有经历一段时间才能总结出经验。

只有经济学家李稻葵定期在微博上发布一些挂职后的心得，也是北京市首批挂职锻炼的学者之一。

不过除了在2011年中关村论坛年会上以官方身份出现外，李稻葵平时也是“挂职不担任具体工作”。

为何学者们对挂职都避而不谈？

2014年底，又一批在北京挂职副局级干部的学者走马上任了。

北大教授张颐武、中科院院士施一公任职文化局、卫计委，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兴凯挂职北京轨道交通公司副总。

“学而优则仕”的老理儿，仿佛在新时期学者身上又焕发了生命力。

今天的“学者当官”会是什么样子？人们关注当代版“学而优则仕”，内心真正的期盼是什么？当理想照进现实，学术与官场，知识与实际之间，又会有怎样的纠结？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新版“学而优则仕” 专业背景有时也是短板，独立精神也会“添乱”



B 爱“开炮”的学者官

“残留农药不控制，再过50年中国人将生不出孩子！”

前些日子，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疾病专家钟南山又在媒体上显露“个人表达”。

从2003年非典爆发，2009年甲流传播，再到近几年的雾霾、H7N9流感、中医转型、抗菌素使用，像上面这样“不中听”的话，钟南山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说。虽不中听，老百姓却最听钟院士这一套。有评论说，这是人们对一个学者专业的信任。

钟南山并非只是一名学者，他不仅是广州市科协主席，还担任着广东省科协副主席，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吸烟与健康医学顾问等职务。

总有人强调官员表达要体大、顾大局，但对一些普通官员避之唯恐不及的问题，钟南山却始终坚持实话实说，把专业身份摆在官员身份之前。

为此，连钟南山自己都承认，在中国这个人文社会里，他得罪了不少人。

“但我做事，不唯上，只唯实。”钟南山说。

学者做官，其有一大难——在两种身份之间，办实事说真话，还能顶住压力。

近代知名的知识分子傅斯年便是一位连蒋介石都无法“镇住”的学者型官员。这位仁兄不仅敢在蒋介石面前跷二郎腿，进入立法院做官以后，还专门挑“四大族”的刺儿。

为了让傅斯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蒋介石专门请客找他谈心：蒋问傅对他是否信任，傅答：信任。蒋又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回

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今天的这样的学者官员依然存在。前些年，对于垃圾焚烧发电这样一个“洋”事物，许多城市项目上马后都急着唱赞歌。但在2010年青岛市两会期间，时任青岛市环保局总工程师的王军借助媒体之口，道出了二恶英污染的危害性以及垃圾焚烧发电的风险性。这一席话，迫使黄岛垃圾焚烧项目停建。

时下最大的环保名词PM2.5，曾让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的杜少中忙坏了。

杜少中在自己名为“巴松狼王”的微博上，与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你来我往”。他强调自己对美国事务说三道四，但作为一名环保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也没有忘记告诉北京市民一个真实的现状：“北京市当时连PM10都未能达标，公布PM2.5，其实毫无意义。”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但杜少中却认为，这是公众应该知道的。

除了向公众表达真知灼见的学者官员，央行行长周小川、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山东省省长郭树清等各界公认的学者型官员都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把“独立”作为知识分子的标志。“知识分子身上追求真理的精神，使得他们不轻易被资本、权力、流行的观念所裹挟。”这一点，是百姓最为看重的。

其实，不谈学者，单说挂职，就很值得细思量。山东省政协副秘书长董利忠说，挂职这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火，为的是协助和提高当时文化层次不高的工农兵干部，但最近几年，随着干部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挂职的热度有所降低。

对于个人来说，挂职锻炼仍是仕途升迁发达的“前奏”。挂职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干部，“以前经常在大学当中找一些处级、副处级干部，平级调任或者升一级任命。工资待遇不变，大约一年以后，再回到原单位上班。”董利忠说。

挂职分为“挂住”、“没挂住”和另外提拔三种结果。除了“没挂住”之外，基本都会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杜贵晨告诉记者，他的老同事吴义勤便是一路挂职，“挂”到了西安市副市长。

2014年12月，第二批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副局级干部刚上任，第一批干部的挂职“效果”也出来了。除了在各领域贡献各自的专业才智外，首批9名挂职专家，在2013年换届中全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其中4人当选常委。

C

当理想照向现实

“这一辈子不会有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做官了。”

这是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在《野火集》序言里的话。在台湾读者心目中，作为文人的龙应台始终是站在批判政府的思考者立场的。

龙应台曾无数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在台湾当官是一件可怕的事，“没有尊严，没有生活，什么条件都是最差的”。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喧哗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耳朵嗡嗡作响。

2012年，龙应台就任台湾地区首任“文化部长”。此后，她受到最严厉的指责：“为什么龙应台当官后就‘变脸’？丧失道德判断力？”“龙应台的自我言论审查所为何来？”“她已经从一个正直的作家沦为世故的政客”……

甚至，龙应台习惯的托腮动作，也让百姓感到做作。

毕竟，官场不是学术圈，百姓看的不是作品，而是政绩。身份转变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人们评价标准的改变。此时，学者做学问时积累的声望，反而成了累赘。

虽然龙应台过去三年做了不少事，但老百姓看到的，依旧是龙应台在用文艺化的语言表述政务。

龙应台不得不在2014年提出辞呈，并

表示要好好休养一下。

同在台湾的李敖年轻时曾猛烈抨击

台湾时弊，可没想到他中年以后竟然也参加政治活动，甚至担任台湾的“立法委员”。对此，他认为自己就像当初北大校长蔡元培一样，做的不是官，而是事。

实际上，除了面临身份转变带来的新压力，理想与现实操作的矛盾，也会让学者做官困难重重。

2014年，品尝到为官不易的不仅是龙应台，还有卸任南科大校长的朱清时。

“人生很脆弱，但人的伟大就在于有思想。”说这句话时，朱清时有些悲凉。

作为中国高校“去行政化”的实践者与领军人物，学者出身的朱清时为实现理想，5年来顶住了许多压力推动改革。

然而，在朱清时卸任时，有评价说，他失败了。

“我们处在一个被‘不信任’紧紧笼罩的时代氛围中。”为官两年后，龙应台悟出踏上仕途之后出现不适的原因。

从社会担当到宦海权谋

可能孔夫子也未曾料想，《论语》中一句“学而优则仕”，竟成就了中国数千年由文人治理天下的局面。但知识分子是否善于做官，仍是历史一个待解的题目。

从北宋士大夫利用所学知识教化乡里，到明清赶考的儒生沽名钓誉，“学而优则仕”经历了知识分子做官从精神追求到物质满足的变化。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学而优则仕”的诱惑

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上千年来自知识分子圈中根深蒂固。

80多岁的历史学者鲁海回忆，多年前，他与师兄袁行霈对此曾有过一番争论。

袁行霈认为，古代为官都是“学而优则仕”，因此古代官员中，出了不少的文人学者。或者说，想要做官，非先做个知识分子不可。

但鲁海回答说，号召知识分子做官，其实并非孔子本意。

在《论语·子张》中，子夏说：“‘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这句话的本意是说做官的人如果有余力就该学习；人读了书如果有余力就该设法做官，进一步推行仁义。所以‘学而优则仕’这句话并不能简单理解成让知识分子做官，因为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要做的不只是官，而是仕。换句话说，百姓期待的‘仕’，其实是士文化的发扬，也就是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担当。

不过，中国社会素有“官本位”的传统。

“官老爷是只有官位没有学问，读书人是只有学问没有官位。这两种人都不是士人的理想。没有学问的官老爷固然为士所不齿，只有学问没有官位，不能在官学之间游刃有余，难道甘心？”学者易中天在《士大夫与读书人》一文中写道。

易中天认为，不当官，学者在历史上就没有发言权。

科举制度不仅让寒门学子有了出头之日，也真正让知识分子有了实现理想的机会。从隋唐兴科举以来，唐宋时期房玄龄、狄仁杰、王安石、欧阳修，明清的刘伯温、张居正、曾国藩、张之洞，都是优秀的学者型官员。

在山东28个文化世家家中，“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演化成为耕读养家、诗书传家、科举入仕等家规家训，成为文化世家兴旺百年的共同规律。

既要做官，也要做师

其实，子夏说“学而优则仕”，有他的道理。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杜贵晨分析，虽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是“马上得天下”，依靠的是一群武夫，但想要坐稳天下，还得用起文人的笔墨。

据说，英国十八世纪的公务员考试，便是参照了中国的科举考试。英国人也发现，官员一定要是读书人，而且是取得了一定功名的读书人。“做学问要心无旁骛，其实，从政也是如此。”杜贵晨说。

古时的知识分子饱读经史子集，对历史、政治以及礼教的知识娴熟掌握，因此对于社会管理有着天然的优势。

“儒家最主要的作用是培养人格，私塾和书院首先教授人的不是知识，而是品德与操守，并让人们学会自律。无论做人，还是做官，每日都要三省其身，自查是否做到了仁义礼智信。这样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去做官，百姓就会在观念上认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法生说。

甚至，在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官员群体承担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是百姓的“领导”，另一方面还是百姓的“老师”。

“孔子说过，知识分子要立功、立德、立言，因此古代的官员们，往往是一边做官，一边做学问，著书立言，教化大众。”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程奇立说。

满清开国元勋一代名相傅以渐就是一位做官一边修史做学问。在任职期间，傅以渐编纂完《明史》，又作《资政要览》后序以及《易经通议》。

道光年间的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自知水务知识不足，每走一地都要去寻访漕运书籍，并用自己的俸禄买回家。在云贵为官时，杨以增还根据学来的知识教化苗民，一时传为佳话。到了晚年，杨以增因读书多而兴建起了闻名海内外的藏书阁“海源阁”，提出了“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藏书宗旨。

学者做官的“死胡同”

大抵是看透了科举做官的弊端，24岁就成为当时安徽省最年轻进士的李鸿章，并没有像

“前辈”们一样，继续走“学而优则仕”的路。

咸丰九年(1859年)末，李鸿章投奔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也就是师爷。

因为在晚清，“学而优则仕”在知识分子眼里已经不值几钱了。

话说科举制度在明清达到极致，但“学而优则仕”却一步步走向它初衷的反面。

清末科举最醒目的现象便是舞弊，读书不再是知识分子的标签，沦为做官的手段。

1858年(农历戊午年)，“戊午科场案”震惊朝野，90余名考官因涉嫌收受贿赂而受到严厉惩处，主考大学士柏葰等5名官员被处死。尽管如此，科场弊端已经积重难返。

科举制度出来的官员，不少都是书呆子，人们还给这样的书生起了一个绰号：“书痴”。

清朝的钱泳在《履园丛话·笑柄·不准》便说：“为官者必用读书人，以其有体有用也。然断不可用书呆子，凡人一呆而万事隳矣。”

在明清时期，学八股文出身并无多少管理经验的新任官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必须倚重师父，甚至有所忌惮。师父与王子之间，往往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相传，王子一家吃饭，如果师父未到，全家是不能动筷的，由此证明师父的地位。古时有句话形容这个群体为“隐身幕后，参与机密，身携一壶酒，胸怀万卷书，宦海沉浮任漂流”。

李鸿章直接做了师父，但后来被曾国藩委以重任，变相完成了“学而优则仕”的梦想。

在当代学者何怀宏口中，客观、真实、追求真理，不能被资本、权力、流行观念所裹挟的知识分子为官准则，其实在晚清已经瓦解。

相传，清中期曾三代为官，备受乡里敬重的济宁孙氏家族，到了清末却出了个卖国求荣的军机大臣孙殿鄂。

程奇立感慨说，同是儒家思想，不过200年时间，知识分子群体便从治世的才子，变成权谋家了。

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也随着旧知识分子群体逐渐丧失知识更新与独立精神，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束缚。

比李鸿章晚几十年出生的晚清第一状元傅以渐的后裔傅斯年，虽然也研习四书五经，但直接选择了留洋之路。而近百年来中国一大批真正的知识分子，最终也没有再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



张颐武

张树华

邢念增

张兴凯

赵进东

孟昭明

杨旭

张树华